

保持优良学风，提高创新意识， 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 南昌会议开幕词

刘重德

各位领导、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按照去年 11 月长沙常务理事扩大会议的决定，由刘文彬和董史良两位同志负责筹备第三次学术研讨会，经过他们多方努力，再加上上海审稿会的准备工作，现已筹备就绪，今天开幕了。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会对热情支持这次大会的南昌大学校长潘际銮，对南昌大学外贸系师生，对出席今天大会的领导和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认真撰写论文的与会代表表示诚挚的欢迎。

今天的发言，包括四个部分。一、继续保持发扬我们学会的优良学风；二、学会成立以来取得的科研成就；三、这次学术研讨会讨论的中心议题；四、如何迎接知识经济新时代。

先讲学风问题。我们一向认为学风是学会的生命所在，优良的学风会使学会永葆青春，不断发展壮大；而不正的学风则使学会衰败，或是自行消亡，或是得不到重新登记注册。因此，我们在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研讨会上就作为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提出了办好学会的初步意见。我们认为，要想办好学会，使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至少要具备这样三个条件：第一，要有一个潜心学术研究并热爱学会组织的群众集体不断为学会的建设出谋划策，添砖加瓦，

帮助它日益成长壮大；第二，要有一个既有奉献精神又能任劳任怨、同心同德、团结合作的领导班子。担任学会常务理事 顾名思义 就是要常理学会之事 无私奉献自己宝贵的时间与精力 考虑与学会工作有关的一切问题，解决它所遇到的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同时在学术方面，还要求他们以身作则，仍能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创造出新成绩，对自己专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与理事和会员携手前进 第三 要有一个正确的办会的主导思想。学会学会，显而易见，其指导思想就应该是时时以学术为重，但我们的“学术”涵义 是在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大好形势下 积极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也就是说，既然国家如此重视知识 尊重人才 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于发展国民经济 繁荣民族文化的建设。总之 我们要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 不要留给后人来做。当然 我们以学术为重 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推动学术研究向前发展。

我们主要采用了两项措施：一是信息公开 二是学术民主。信息公开的具体做法是：1. 在有关学术刊物上报道举行研讨会的消息；2. 在本会不定期印发的简报上公布征稿议题；3. 向知名的专家学者约稿。只要作者是根据征稿议题或本会三个研究范畴抱着以文会友的目的为本会研讨会专门撰写的文章，均受欢迎。信息公开的做法 从长沙、青岛和南昌三次研讨会所收到的论文数量和质量来看，都证明行之有效。论文数量的多寡和论文质量的高低 是表明研讨会成败的主要标志。我们第一次研讨会 收到论文 83 篇 第二次研讨会收到 98 篇，第三次研讨会收到一百余篇；论数量 三次都相当可观 论质量 均优中选优地编印出版了一本高质量高标准的论文集。一、二辑已经出版 第三辑亦将按惯例编印发行。

本会的学术民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审稿选稿的唯一标准 是看论文本身的水平 不分年龄大小 资历深浅 学术面前 人

人平等二是表现在分组讨论与大会发言相结合的安排上 让与会代表均有机会发言，表达各自的学术观点。

常务理事会议扩大会议之所以要我在开幕式上重申我们所倡导的学风 是因为亲眼看到了也亲身体会到了这样一个真理 学风端正与否是一个学会成败存亡的关键。学风端正，学会就能生存下去 并且日益兴旺发达 不端正 它就一定会招致失败 以致夭折 结果只能是昙花一现，名存而实亡。省级学会和全国性学会都有不少痛苦的经验教训 我们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 避免重蹈别人失败之覆辙。

学会这种群众性的学术团体，一般说来 都是由它的团体会员或个人会员组成的。因此会员学风的是否端正，直接影响整个集体的会风。截至目前为止，我们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这个群众性学术团体，无论是它领导班子的成员，还是它现有的个人会员，总的说来 所表现出来的学风都是端正的 几乎可以说是人人都为学会带来了名声和生机，无愧于品学兼优的专家学者这一光荣的称号。为了维护我们学会所已经取得的声誉，常务理事会议又明确议定了接纳会员的三条标准 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学风端正 以保证以后吸收会员的品德素质。我们要永远保持虚怀若谷的态度、严谨治学的精神 因为一个人学问再大 也不过是沧海一粟 经过终生努力 自己也只能做到有一技之长。“全能专家”古今中外都不曾出现过 也永远不会出现。自高自大目无他人 实质上是幼稚无知的表现，绝不会赢得群众心悦诚服的敬重。孔子是全球都承认的位列全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他整理《诗》《书》删定《春秋》 弟子三千 贤者七十二人 历代奉为师表 学问修养不可谓不高，但他终生虚怀若谷，求学上进。孔子有许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 我们应该学习他“敏而好学”、“学而不厌”以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不断学习上进的精神 第二应该学习他“诲人不倦”、“有教无类”、“己欲立而立，己欲达而达人”的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 第三 应该学习他“知之为

知之 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为人态度 第四 应该学习他边学边思、边思边学，学思结合的有效方法。总之，我们的会员都应该是品学兼优 既自尊自爱又尊重别人 爱护别人 以文会友 以友辅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我们著书立说，实事求是，绝不夸夸其谈 哗众取宠 沽名钓誉 对中外文化遗产 糟粕要扬弃 精华要继承，并使之发扬光大，有所前进，有所发展，为三个有关学科的建设、为弘扬中华文化而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一言以蔽之，曰：我们反对一切不务正业而沽名钓誉、招摇撞骗的伪学者。我们呼吁学会理事和全体会员来共同努力维护科学的尊严，净化学术的环境，认真把我们学会的学风建设得更好，无愧于学人的清白与光荣。道德之光能燃起智慧之火，而一切道德高尚的学人必将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取得可观的成就，从而使学术生命放出灿烂的光辉。

其次，讲一下学会成立以来的科研成就。有了上述优良的学风，就随之而有了比较可喜的科研成就。自 1994 年成立那一年算起，短短五个年头内，在有关的三个学科专业方面，仅就我们所闻所见已经出版的部分专著来说，堪称硕果累累，例如：英汉语对比研究方面有：[1]杨自俭、刘学云主编的《翻译新论》（1994）；[2]刘重德主编的《英汉语比较研究》（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4）；[3]潘文国著的《汉英对比纲要》（1997）；[4]邵志洪编著的《英汉语研究与对比》（1997）；[5]学会编辑的《英汉语比较与翻译》（1998）；[6]熊文华的《汉英应用对比概论》（1997）；[7]萧立明主编的《英汉语比较研究’97 论文》（1998）。翻译研究方面有：[1]吕俊、李德凤编著的《英汉翻译的理论与方法》（1994）；[2]刘重德著的《浑金璞玉集》（1994）；[3]杜承南、文军主编的《中国当代翻译百论》（1994）；[4]申丹著的《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1995）；[5]刘重德主编的《三湘译论》（1995）；[6]陈宏薇编著的《新实用汉译英教程》（1996）；[7]孙致礼的《中国英美翻译十七年概况》（1996）；[8]蔡新东、郁东占的《文学翻译的释义学原理》（1997）；[9]郑诗鼎

著的《语境与文学翻译》(1997);[10]张今、董史良、谭载喜等参编的百科性的《中国翻译词典》(1997);[11]陈宗华、蒋坚信主编的《外国语言文学与翻译论文集》(1998);[12]陈宏薇主编的《汉英翻译基础》(1998);[13]黄振定著的《翻译学》(1998)。语言文化研究方面有[1]李瑞华主编的《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1995);[2]罗选民、余协斌主编的《外语、翻译、文化》(1997);[3]钱冠莲著的《汉语文化语用学》(1997);[4]林汝昌、周旭著的《中英书法艺术比较》(1998) 英汉双语词典方面有[1]李中和李亚舒主编的《新英汉缩略语大词典》(1996);[2]王文昌主编与王菊泉、左飙等副主编合编的《新世纪英语用法大词典》(1997)等等 等等。我们见闻有限 必定是挂一漏万。如发现重大遗漏,务请会后立即见告,以资补充。至于五年中在重要期刊和文集上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社出版的译著 则更是不胜枚举。此外 国家社科项目 据初步片面的了解 我会成员担任的约有 5 项,例如张今的《英汉语篇信息结构对比研究》、马秉义、徐有志的《英汉语篇模式研究》、何善芬、白解红等人的《英汉对比语言学研究》 穆雷的《中国翻译教学研究》等等 有的即将结题,有的正在顺利进行中。这些课题的完成及其研究成果的出版,可以断言,将对各有关学科的发展起很好的推动作用。

第三,讲一下这次学术研讨的中心议题。青岛会议后,为了筹备好第二次代表会和第三次学术研讨会,我们先后召开过两次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一致决定在南昌大学召开并议定了中心议题为“加强理论与应用研究,进一步推动三个学科的建设,迎接知识经济新时代的到来”。我们提议与会代表重点讨论以下问题。

1. 英汉语比较研究方面

(1) 英汉对比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三级学科,其理论结构体系应如何构建?

(2) 英汉对比研究应以汉语为主体,还是以英语为主体?还是同样看待?

(3) 对比语言学应以两种语言的差异为研究重点,还是以其

共性为研究重点？还是二者并重？

(4) 英汉应用对比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如何进行建设？

(5) 英汉对比语言学主要研究方法有哪些？

(6) 英汉语言、词语、句子、句群、篇章、语用、文体与修辞等层次的理论与应用方面的对比研究。

2. 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

(1) 翻译学科的定位问题再探。

(2) 翻译理论的体系问题。

(3) 翻译的美学问题与语言学问题。

(4) 翻译标准的量化问题。

(5) 英汉翻译的教学问题。

(6) 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其他问题。

3. 英汉文化比较研究方面

(1) 英汉文化比较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2) 英汉文化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3) 英汉比较文化学的定义与定位问题。

(4) 英汉比较文化学的构建与体系问题。

(5) 英汉文化比较与翻译。

(6) 英汉文化比较与英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

我们的学会自成立以来得到了较快发展，也使我们更加明确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学会的任务应当是通过学术研讨 活跃学术思想 提高创新意识 加强协作与交流 促进学科和学术队伍的建设与发展，积极为国家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这既是我们学会的任务 也是我们办会的方向。

同志们 朋友们，²¹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它将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新时代。这种经济不仅会改变经济的结构和总体布局，而且会改变社会组织结构和人类的生活方式。全球化、知识化、网络化、数字化等将是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 而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则

是知识经济的核心。而对这样的时代，党和国家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我们学会也要无愧于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为了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我们一定要把学会办好，现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供大家思考与讨论。

1. 大力增强创新意识。学术研究的灵魂是创新，学科发展的标志是创新，学者的成就也在于创新。世界各国历来都把创新程度的高低作为衡量科研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学者的创新能力主要表现在善于从学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发现新问题，善于针对学科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标新立异，善于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继续研究，不断前进。创新能力需要丰富的知识，需要学思结合的独立思考，需要创新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毅力。

2. 优化知识结构。我们的教育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在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方面还存在明显的缺陷；知识面比较狭窄、创新性思维比较欠缺等。这些不足之处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我们每个人都应依据自己研究领域的要求和自身条件，采取缺什么补什么的方针，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以期进行更有效的科学研究。譬如说，外语出身的同志需要认真用功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数典不能忘祖，中文出身的同志需要进一步提高英文的修养，以便更好地利用英文资料，并于必要时能跟外国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此外，还需要学习数学的理论与方法，学习逻辑学、唯物辩证法，学习与自己的研究有关的学科，尽量做到文理相融，中外互通，以弥补自己的不足。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也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需要。

3. 学会要努力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开展多学科交流，因为单一的学科难以发展。只有多学科交流，才能产生新的思想，才能产生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

4. 加强理论研究的同时要突出应用研究，理论与应用研究性质不同，但二者密切相关，不过有时候二者可分别进行。我们的三个学科在加强理论研究的同时，应当努力开拓应用研究的领

域 比如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翻译教学、语言交际、信息处理、机器翻译、辞书编纂等，这些领域下个世纪会提出新的要求，都会大有作为。

5、学会要创造更好的学术环境，加强组织建设，促进学科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学科发展和学术队伍的成长都需要良好的学术环境。要创造这样一个学术环境，我们学会就要追踪我们三个学科的发展前沿，要跟踪国际发展的最新动态，不断更新自己的学识。要扩大学术交流的范围，邀请其他相关学科的专家讲学或参加学术交流。再就是要改革学术研讨会的开法。大会和分组会除个人宣讲论文要点之外，都应增加有准备的评论与提问，还应就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安排专题讨论或辩论，以激发新的思想的产生，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另外，我们提议，在这次会上正式成立英汉文化比较研究专业委员会，以便有力地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

以上发言 不当之处 务请批评指正。谢谢！

简论对比语言学中的几个问题

杨自俭

英语中 *contrastive analysis*, *contrastive studies* 和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三个名称经常相互替代使用。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三个名称的含义基本一样,但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是更正规的名称。有些语言学家使用三个名称时,其含义又有差别 *contrastive analysis* 使用较早,是从比较语言学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研究中产生的,它是语言分析的一种方法,较多地指应用性对比研究,而 *contrastive studies* 则兼含具体的理论与应用两方面的研究。这仅是一般情况,我们在阅读英语的对比语言学文献中还应注意作者对这三个名称的区别作用。

现代对比语言学是从欧洲和美国发展起来的。20 世纪初布拉格学派中不少语言学家对 *contrastive analysis* 发生了兴趣,代表人物马塞修斯《*Mathesius*》于 1926 年发表了关于英语与捷克语对比分析的文章。1941 年美国语言学家 B.L. Whorf 在他的《语言与逻辑》(*Language and Logic*) 文中第一次使用了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这一名称,并作了这样的论述:

Much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classifying the languages of the earth into genetic families, each having descent from a single precursor, and in tracing such development through time. The result is calle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Of even greater impor-

tance for the future technology of thought is what might be called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This plots the outstanding differences among tongues—in grammar, logic, and general analysis of experience.

U. Weinreich (1953) 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写了一本《语言接触》(Language in Contact), 提供了一个对比分析概念框架, 提出了“干扰”(interference) 这个理论命题。Robert Lado (1957) 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对比语言学专著《跨文化语言学》(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这部书是严格遵循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的, 因为这个时期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导地位还未被转换生成语法所代替。Lado在此书的序言中说:

This book presents a fairly new field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the analysis of culture, namely the comparison of any two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o discover and describe the problems that the speakers of one of the languages will have in learning of other. The results of such comparisons have proved of fundamental valu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tests, and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ments.

N. Chomsky 的转换生成语法产生后, R. Stockwell, D. Bowen 和 J. Martin 等就带头运用乔氏的理论进行对比研究, R. J. Di Pietro 和 T. P. Kreszowski 试图用乔氏的理论建立自己的对比语言学理论框架。C. James (1980 在《对比分析》中进行了阶段性总结, 理论上采用了折衷主义的做法, 但他认为“Pure contrastive analysis is a central concern of applied linguistics. 随着篇章语言学 Text Linguistics 产生, R. R. K. Hartmann, U. Connor 和 B. Hatim 等用篇章语言学理论写出了篇章对比研究的著作, 还论述了此种对比与翻译的关系。除此以外, 也有人用生成语义学 (generative semantics) 和系统功能语法等理论进行对比研究。

我们讲了这些状况是想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 对比语言学从一

产生就十分明确，是属于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学科，它强调重点研究两种语言的差异，这一特点从沃尔夫、拉多和詹姆斯的论述中看得很清楚。拉多当时还提出要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但没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近几年才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注意。对学科性质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逐步深化的。到 70 年代中期，P. V. Buren 和 R. Dirven 提出对比语言学对外语教学无用，但可以增强对语言结构的认识，可以了解语言体系之间的关系，即作为一种发现程序 (discovery procedure)，以寻求不同语言的通性。P. H. Breitenstein (1978) 认为对比语言学可分为科学性的和教学性的两类。第二，对比语言学没有自己的理论，它随着理论语言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着语言学理论的变化而变化。从一产生它就依附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后来随着其他语言学流派的产生，也采用这些流派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对比研究。迪皮特罗总结说：“一种对比分析会变得同与之相连的语言理论一样复杂，这个道理是值得牢牢记住的。一旦理论发生了变化，新的对比途径也就会出现。如果理论本身有不一致的地方，那么，在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对比分析时，这些矛盾也就会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

国内的英汉对比研究早期的有严复的《英文汉诂》，这个时期还有马建忠、黎锦熙、赵元任、王力和吕叔湘等都对汉外对比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赵元任和吕叔湘在英汉对比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赵元任 (1933) 就发表了 *A Preliminary Study of English Intonation (with American Variants) and Its Chinese Equivalentents* 后来又出版了《国语入门》、《语言问题》、《汉语口语语法》和《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等。他总结说：“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研究的科学结论。”吕叔湘 (1942) 明确提出“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言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并在书中“把汉语同印欧语尤其是英语作了画龙点睛式的比较”。他在《中国人学英语》序言中说：“我相信 对于中国学生最有用的帮助是让他认识英语和汉语的差

别。”1977年发表了《通过对比研究语法》的著名演讲 第二年亲自招收了我国第一个英汉对比语法专业的 3 名硕士生 应该说 英汉对比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正式诞生了。吕叔湘 (1990 为《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 题词: “指明事物的异同所在不难 追究它们何以有这些异同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 题词高屋建瓴地为这个学科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所以成了学者反复引用的名言。

王宗炎 (1983) 把对比分析分成纯理论研究和供教学使用的研究两种, 前者要求严格、详尽, 后者要求抓住重点。赵世开 (1985) 指出 “语言对比研究不仅限于教学的目的, 它也可以用于语言结构普遍现象 (universals) 的理论研究, 甚至结构分析中方法论的探讨。不过它跟语言教学关系十分密切, 一般都把它列入应用语言学的范围。”刘宓庆 (1991) 说: “对比语言学是很有发展前途的一门应用语言学科。”许余龙 (1992) 为对比语言学下了一个定义: “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 其任务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 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 特别是其中的不同之处 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他有关领域。”

从国内英汉对比研究来看, 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 吕先生的研究是从比较语言学到对比语言学的 前两本书中用“比较”, 后来的演讲中开始用了“对比” 虽然有时还二者混用 但已经注意到两者的区分, 前者是历时的, 后者是共时的。这是跟英语中 comparative 和 contrastive 的使用相一致的。第二 “英汉对比研究” 和 “汉英对比研究” 两个方向已经清楚。搞英语教学与研究的以英语为基点 拿汉语来对比 是英——汉方向, 搞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的以汉语为基点 拿英语来对比 是汉——英方向。当然也可以双向同时对比。另外赵世开主编的《汉英对比语法论集》, 学习吕叔湘以范畴为基点的方法, 从范畴向英汉两个方向展开。这是一种不同于上述两个方向的方法。第三, 学科名称尚未统一。有的叫对比语言学, 有的叫英汉对比研究。根据 1992 年 11 月 1

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GB/13745~92)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一级学科下比较语言学二级学科下的一个三级学科,名称叫双语对比语言学,跟它并列的还有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类型比较语言学。因此英汉对比研究作为学科正式名称应定为“英汉对比语言学”,英文名称可为 English-Chinese Contrastive Linguistics,简称为 ECCL。第四,学科的性质问题。国内的研究大多认为该学科是属于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的重点在于语言之间的“异”。再一点吕先生已提出要追究何以有此异同的问题,这就要求要在“解释”上下功夫。笔者 1994 这样界定了对比语言学:“它是语言学的一个分科,兼有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特征,其任务主要是对两种或多种语言进行共时对比研究,描述并解释所对比语言之间的异同,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理论研究和语言应用领域。”这个定义强调了学科的理论与应用的两重性,而不单纯属于应用研究;强调了描述与解释并重,使学科功能进一步深化,强调了异同并重,改变了只强调“异”的说法,这也是现代语言学发展的需要。今天看来这个定义还应再强调一点,共时与历时两种研究并重,因为要解释异同恐怕非进行历时研究不可。所以上述定义可改为:“英汉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兼有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性质,其任务主要是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共时和历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并解释英汉语之间的异同,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理论研究和语言应用领域。”

我国的英汉对比研究从 70 年代末逐步发展起来。从 1977 年至今这 21 年据不完全统计,发表论文 633 篇,出版著作 35 部。1989 年以前发表论文 200 余篇,出版著作 10 部,90 年以来发表论文 400 余篇,出版著作 25 部。80 年代以微观研究为主,主要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10 本著作中有 6 本是语法的,两本成语的,一本修辞的,一本文化的。90 年代的研究已扩大到句群、语篇、修辞、文体、语用、文化等层次,25 本著作中专著 16 本(其中一本为译著),论文集 9 本(其中一本主要为译文),在这些著作中,应该

说刘宓庆、许余龙、连淑能、郑春苗、李定坤、潘文国、熊文华、邵志洪、刘英凯的专著都自成体系 并有所开拓 有所突破 在深广的程度上超过了 80 年代的水平 比如有了通论性的理论专著、应用对比的专著、语音修辞和文化对比的专著等。关于语法修辞的几本专著也都颇有特色，在理论与应用方面都很有建树。9 本论文集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学科建设，论文集中被引用和参考较多的除吕叔湘先生的论文以外 还有王还、王宗炎、赵世开、胡壮麟、刘宓庆、王菊泉、沈家煊等先生的文章。随着学科的发展和语言文化教学（包括英语和对外汉语）改革的深入，纵观中外对比语言学的发展，我们感到英汉对比研究有三个方面的不足：① 英汉对比语言学自身理论建设没受到足够的重视。② 英汉语微观各层次系统的量化对比研究很不够。应用对比研究还缺乏广度与深度。

1. 理论建设问题

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理论的学科难以得到发展，也难以成为科学。当然理论的建设是随着学科的发展而逐步系统和完善的。对比语言学是一种交叉学科，从产生以来一直借用传统的、结构主义的、转换生成的以及功能主义的语言学理论，而没有很好地建设自己的理论，所以至今没建立起对比语言学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我们从事的英汉对比研究，和美国与欧洲的对比语言学还不完全相同。他们的对比基本是在印欧语系中两种语言之间的对比，其中的异同及其原因跟英汉语之间的异同及其原因是相差很大的。他们的理论我们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所以要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就必须建设适应于英汉对比语言学的理论。怎么样进行理论建设？主要靠三方面的工作。第一要认真研究英汉对比的发展史，这是基础。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必须以自身的经验为基础，如果研究的基础一点也没有，先进的理论“移”过来也无处可“植”。第二要借鉴。借鉴比自己先进的理论与方法，这是学科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引进，就无法比较，没有比较 就无法看到差别 看不到差别 就无法做到取长补短 也就

无法发展自己。我国学科发展史的研究比较多的是文献史。文献史也有作用,但要推动学科进步,更重要的是研究学科的思想史,也就是重要观念和范畴发展变化的历史。要重点研究学科产生的原因以及发展的动力、规律与趋势,尤其要注意对各个转型期的研究,要抓住学科发展所遇到的难题,谁提出什么理论与方法,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等。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从早期追踪到现在,就比较容易把形成的观念和认识升华成理论系统。在研究学科发展史过程中,应当关注英语发展史和汉语发展史的研究,借鉴国外对比语言学史的研究 这样会使你的理论思考视野更开阔 根基更扎实,形成的概念也更科学。借鉴首先要明确借鉴什么。科学的发展已进入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时期,单一学科靠自己已难以有突破性发展。所以我们的视野要更广一些,除借鉴语言学各学科(理论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修辞学、文体学等)的理论外,还应借鉴哲学、新老三论、文化学、人类学、信息科学以及数学与其他自然科学的理论 以开拓研究领域,改进研究方法。其次借鉴一定要注意消化,先弄明白人家理论与方法的本质、结构、功能、适用范围及局限性,而后结合自己的研究,寻找二者的结合点,在结合中产生新的认识,新的概念。借鉴的目的是促进我们的研究,而不是只空讲人家的研究。

第三,我想特别提出要关注中外哲学的新发展。学术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学术研究必须以哲学思维的更新为先导。美国哲学家 A. P. Martinich 说:“当哲学搞得出色时,它就有助于科学的诞生。亚里士多德的工作使生物学得以诞生,布伦坦诺和詹姆斯的工作使心理学得以诞生,弗雷格的工作使逻辑哲学和数学哲学得以诞生,蒯因和哥德曼的工作使转换语法得以诞生。类似地,语言哲学使认知科学得以诞生。”

2. 研究模式

英汉对比研究也像其他语言学研究一样,从总体上看,可有三种研究模式。一种是微观描述,这是大量的基础的研究,各个微观

层次描述,都应占有大量语言材料,最好有涵盖面较大的统计,或者有能反映规律的抽样调查。涵盖的面越大,占有的材料越丰富,归纳出来的规律才越有普遍性,也才有价值。过去这种归纳法研究太少了。现在微机的使用已普及,所以要用现代化的手段,进行英汉语料的调查与统计,一项一项地进行系统的研究。这样积累起来才能逐渐找到规律。关于语料库的建设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冯志俄(1989)指出:“语料库是存储于计算机中并可利用计算机进行分析的语言素材的总体。”英国有 Survey of English Usage 和 LOB Corpus 美国有 Brown Corpus。我国有了 BLI Corpus(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但我们还没有国家级的大型现代汉语语料库。有了这样的中英文语料库我们就可以进行涵盖面较大的各种项目的对比研究。另一种研究是理论解释。这种研究旨在检验某种理论的有效解释力,其方法是运用大量的语言材料对已有的理论进行验证,看它的概括是否全面,看它的判断是否正确,从而说明这种理论是否有普遍性。这种研究常伴随着一些新的发现,发现要对已有的理论进行补充、修改或更新。第三种是应用研究。我们过去有轻视应用研究的倾向,从理论上我们应当清楚任何研究都应适应社会的要求,而对社会永远没有应用价值的学术研究,恐怕无法存在下去,尤其在现代社会。要转变旧观念,不要把应用研究只看成应用,很简单,不用研究,而要充分利用理论研究的成果把应用研究深化,既提出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的策略,又对理论成果进行检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应用研究可以以本学科描述研究为基础,也可以以本学科理论研究为基础,还可以以其他学科的理论为基础。理论研究应以描述研究为基础,描述研究应以理论研究为导向。这三种类型的研究应齐头并进,不应有高低之分。

3. 研究的内容与重点。

研究内容可分为四个方面:微观、宏观、理论与应用。微观研究应包括语音、词汇、词组、句子、句群、语篇、修辞、文体等两种语言系统本身的结构、类别、功能以及各层次之间的关系。重点应是

各层次的表义功能及语用特征。值得提出的还有英汉两种文字对各自语言的影响问题，过去我们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现在应引起大家的关注。宏观研究包括语言各层次如何受社会、文化、思维模式的影响，以及语言在结构与功能上形成的特点。要特别重视微观与宏观两种研究产生的反差，这很可能是使研究深化的良好契机，所以要二者同时进行并要有意识地把二者的成果加以对照。理论研究主要着眼于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的性质、地位、范畴、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等。而现在重点应是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的探讨。应用研究应有较多的人参与，目前应积极开展外语教学与学习（包括对外汉语）、双语词典编纂、机器翻译等方面的研究。研究的重点应为教学与学习的心理过程、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包括写作与翻译能力）的培养等问题，这些方面的对比研究，对促进外语教育的改革和提高教育质量会提供有价值的依据与对策。在应用研究方面我们还应关注机器翻译问题，机器翻译的困难在于语义的形式化，这几年围绕语义的处理问题做了不少有成效的研究，重点在探讨语义功能的确定和意义结构的建立。

4. 优化知识结构问题。

搞英汉对比研究，肩负两个任务，既要研究英语，也必须研究汉语，二者都要下功夫。吕叔湘先生生前一直为“我国外语界和汉语界不相往来、‘两张皮’的现象深为忧虑”。许国璋先生（1991）说：“今天的中国外语界显学有二，一是生成，二是功能。这两者的工作，引进外国理论，证以外国例子居多，从汉语例子着手不多，以解释汉语为目标的更少。假定我们做汉英对比，首先要把两种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弄清楚，把它们的静态描写和语用描写弄清楚，在取得了正确的、全面的系统的描写以后，逐项逐条进行对比，宁可繁而不漏，也不取实而不备。用几条零星的翻译偶得或教学札记是不够的。不首先通晓汉语语言学更是不够的。”要做英汉语对比研究，英语与汉语都不应只看作是工具，其研究者应成为精通两种语言的文化人，这是学科发展的要求。有了这种认识，才能